

【德】克里斯蒂娜·冯·布劳恩、英格·斯蒂芬 等著

史竞舟 译



科学中 的 性别

Gender @ Wissen



人民教育出版社

【德】克里斯蒂娜·冯·布劳恩、英格·斯蒂芬 等著

史竞舟 译



Gender @ Wissen



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可扬
装帧设计:安宏川
版式设计:于丽娟
责任校对:张杰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中的性别/(德)布劳恩等著;史竞舟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
ISBN 978-7-01-013230-3

I. ①科… II. ①布…②史… III. ①科学研究 IV. ①G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9626号

北京市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01-2010-6893

Gender @ Essay by Christina von Braun, Inge Stephan (eds.) © 2005 by Böhlau Verlag GmbH & Co., Köln Weimar Wien



科学中的性别

KEXUE ZHONG DE XINGBIE

[德] 克里斯蒂娜·冯·布劳恩、英格·斯蒂芬 等著 史竞舟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2.25

字数:395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978-7-01-013230-3 定价:56.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引 言	1
作为知识的性别	2
课题领域	43
身 份	44
身 体	65
生 育	79
复 制	101
性	119
暴力/权力	134
全球化	151
表演/再现	172
生命科学	189
自然/文化	207
语言/符号学	228
记 忆	244
区别与关联	267
后现代	268
酷儿理论	288
媒介理论	305
文化研究	324
人名译名对照表	345

引 言

作为知识的性别

克里斯蒂娜·冯·布劳恩(Christina von Braun)

英格·斯蒂芬(Inge Stephan)

知识体系与象征性性别秩序

本书以知识/科学与性别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切入点,通过若干不同领域和不同选题的文章阐述了以下观点:知识体系与性别秩序两者间的关系始终深受自然-文化、身体-精神二元论的影响,而这种二元论本身即包含了具有塑造作用的文化与被规训、被塑造的自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象征性性别秩序的两极分别与不同的性别指定相对应,从而使这种区分得以“自然化”:男性代表精神与文化,女性则象征自然与身体。时至今日,这种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归类方式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表述方式,例如“女人的非理性”、“难以估量”以及由此衍生的“非科学性”,等等。但这种二元论仅仅构成了我们思考的起点以及知识体系与性别秩序之间历史关联的源头。继这一原初“设定”之后开始的一段发展,在过去两百年间表现得尤为显著,并且在知识体系与性别秩序两个领域都引发了激烈变革。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为,这些变化之所以同时发生并非偶然——确切地说,在知识体系与象征性性别秩序的变迁之间,存在一种历史及内容层面的紧密联系。

在现代科学中,“传统”的文化/自然二元论同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分裂日益重叠,这种分裂在象征性性别秩序中同样有所体现:自然科学一方面被视为“硬科学”,另一方面也被视为男性的专业领地;而人文科学则往往被作为“女性”对待,人文科学专业的师生中女性比例远远高于自然科学专业。学科专业的“性别化”区分并非基于两性各自特有的天赋或兴趣,它所涉及的是一种象征性性别秩序,这一点可以通过以下

事实得到证明:20 世纪初,当女性终于开始有权利接受大学教育时,她们大多选择了医学或自然科学专业;相反,以哲学与历史学为主导的人文科学专业却迟迟不肯向女性研究者敞开大门。然而,这种状况在短短几十年后便发生了逆转。在当今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女性学者仅占少数,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女性却人数众多。这种发展很难用“天赋”一词加以解释,其背后的原因更多的是与知识体系的性别编码有关。信息学专业在日后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20 世纪 60 年代,当一些大学刚刚开始设立信息学专业,女生人数寥寥无几;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信息学专业的女性比例开始迅速增长,一度超过 20%——对于一门工科专业而言这个数字甚为罕见;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女性比例又有所回落。关于这一现象的经验性研究表明,这样一种波动既不能用女性在技术思维能力方面先天或后天的缺陷来解释,也不能归因于不同性别具有不同的人格结构。^①确切地说,它似乎同知识体系本身及其性别编码的变化有关。

从知识体系“最初”的二元论角度来看,自然科学“男性化”与人文科学“女性化”的现象隐含了这样一点:如果说男性现在更多的是与自然相关,而“文化”更具女性特质的话,则原先将男女两性分别等同于精神和自然的旧秩序便发生了一次彻底的逆转。人们或许会将这种转变解释为知识领域象征性性别归类的普遍取消。而事实恰恰相反——象征性性别归类依旧存在,只是其符号发生了逆转。因此,转变的原因或许在于“自然”与“文化”(或曰身体与精神)概念在知识体系内获得了一种新的位置,事实的确如此。直至 17、18 世纪,神学在欧洲的大学里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专业。科学如何发挥作用、科学认知成果如何获取,所依据的原则均来自于神学。近代以后,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为科学提供指导原则的任务首先转移到了哲学与历史学领域,民族共同体的“意义”及意义给予(Sinngebung)问题是这两门学科研究的核心。今天如果

^① H.Schelhowe,《信息学》(Informatik),见 *Gender Studien.Eine Einführung*,Stuttgart,Weimar,2000,第 207—216 页。

有人问及哪些学科应被视为大学里的主导学科,他得到的答案往往是生物学或医学等自然科学专业。其原因甚为矛盾:一方面,这些专业由于涉及“硬科学”而成为了主导学科,也就是说,在此运用的是可以量化和(大多)可被证实或证伪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它们之所以成为主导学科,是因为一度为神学所独占、而后又作为关于“世界精神”的憧憬或“永恒民族”概念而转移到哲学与历史学领域的“人类永生计划”,在今天更多地寄期望于医学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最能清楚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基因研究,该领域所运用的隐喻以及本身所依据的研究范式都显现出与基督教思想传统不容忽视的相似性。

人文科学的“女性化”或许也可通过这些学科的边缘化来解释,且这种说法时有耳闻。事实上不难发现,女性越来越多地在那些她们丧失了公共话语权的领域找到栖身之处;相反,在教育学以及教师职位等一些由女性“占据”的领域内,也同样上演着一场男性的“出埃及记”。然而这种解释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未能回答以下这个问题,即以神学为起点、经由历史/哲学直至自然科学的“知识等级制”变迁究竟何以发生。此外,假设每一种将知识领域同性别相对应的归类做法不仅是新的科学或媒介范式所带来的结果,而且还负有将知识体系自然化的功能,则需要以全然不同的另外一种方式来提出关于知识领域性别归属的问题,即被“自然化”的究竟是哪一种秩序,以及这种自然化的过程是以何种方式发生。

性别编码从科学领域的移除:经典与纯洁

概括来讲,知识体系的“自然化”经历了一个双重和矛盾的历史过程:起初是对性别的排斥,随后则是对性别的接纳——确切地说即性别编码的植入。这一双重过程是通过何种方式在不同的知识领域内进行并得以反映,对此本书中的文章将分别做以清晰的阐释。知识体系自然化这一矛盾的动态过程在“纯洁”或“纯粹”概念上体现得尤为显著,此概念之于科学的意义与“经典(Kanon)”相类似。关于“经典”概念的性别编码

已有较为详尽的研究。^①“经典”概念最早起源于建筑艺术,大致意为准则、比例与标准。古希腊雕塑家波利克里特(Polyklet,大约公元前480—前400年)曾借用“经典”一词来描述理想的人体比例,但他只以男性身体为例对此做过说明。而后这一概念又被重新用于描述城市建筑或大型宗教建筑的构造,这些建筑旨在赋予“社会身体”以人体的外形和理想比例。如今,“经典”一词仅指在各个学科中被奉为典范和具有标准意义的文本。而问题在于,人们很难明确指出经典应有的理想比例,而只能通过举出“不合标准”的反例,以便与标准性的“经典”相区别。这也就意味着,经典的定义总是取决于对“非经典”的命名。根据历史需要以及对知识体系具有决定作用的新媒介存储系统的不同,经典有着各种不尽相同的形式,而它们却有一个唯一的共同点——性别编码。

“Reinheit”(意为“纯洁”、“纯粹”)概念对于科学和知识领域的确立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很少有概念像它一样,对个体和群体的思维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力。“纯洁”几乎在所有的知识领域中都占据了关键位置,这些领域包括宗教、政治、性、语言、文化、心理学,等等。“Reinheit”在每个知识领域中都有不同的含义,但这些含义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起到了区别和排斥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词干“rein”的起源加以解释:“rein”源自古代德语和中古高地德语^②中的“rein”和“hreni”,本意为“经过筛分”或“经过清理”。^③“rein”意为“进入”或“吸纳”,除“接纳”之外也兼有“排斥”的含义。只有通过“不纯洁”相区别才能对“纯洁”加以定义,对于许多知识领域来说,这就意味着必须首先对什么是“污秽”与“杂质”加以命名或“仪式化”(中世纪大学里

① R.v.Heydebrand,《经典造就文化:美学经典的理论、历史及社会建构》(*Kanon macht Kultur. Theoretische, historische und sozial Aspekte ästhetischer Kanonbildung*, Stuttgart, Weimar, 1998)。

② 大约公元11—15世纪间的高地德语。——译者注

③ 参见O.Gaupp,《“rein”词语发展史》(*Zur Geschichte des Wortes, rein*, Tübingen, 1920)。

类似于教会的着装制度即为此例仪式之一,该制度在女性获准进入学院后开始消失并非偶然)。

正如西方“科学”以神学为发端,“纯洁”一词也有着宗教方面的渊源。一般而言,任何一种宗教都会以各自特有的方式提到有关纯洁的律法,或者提到超验之物的“纯洁”和尘世之物的“不洁”。而“纯洁”在每一种宗教中的含义都不尽相同。例如在犹太教中“纯洁”与仪式方面的教规有关,根据这些教规,犹太教徒必须在特定食物之间进行严格区分,并以此来区分神圣与世俗;^①而在基督教传统中,这种区分则往往表现为相似但又有着严格区别的图像之间的对照:例如在一些绘画作品中,殉道者的“圣洁”之血与“性”或“有性身体”的“不洁”之血构成了鲜明对比。^②正是基于上述对照,梅毒又被称为“不良血液”。世俗化之后,基督教中关于“纯洁”的图像又在许多现代知识领域得以重现。例如,在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清洁、卫生和健康是一种“好”的东西,而所有与“污秽”有关的事物则被打入异类。这种所谓“纯洁”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归类,比如人们普遍都有这样的体验:当一个人置身于陌生场所或陌生国度的时候,他会对污秽更为敏感。在描绘对陌生事物的感受时,人们往往惯于使用与邈邈或恶臭有关的词语和图像。这种感知继承了一种历史久远的精神传统,在这种传统中,陌生或需要加以排斥的事物总是被等同于污秽或不洁。纯洁(或世俗意义上的纯洁)也在此意义上被不断地赋予了政治功能:例如反犹太主义分子常谈及所谓大众身体的“纯洁”与犹太血统的“不洁”。当今的现代科学或许会并不认为类似的知识领域及其知识形态是一种“硬科学”。然而,正是这些被生理化了的神学话语在 19 世纪推动了整个知识体系的转变,为自然科学成为主导科学提供了帮助。

① M.Douglas,《纯洁与危害:不洁与禁忌观念研究》(*Reinheit und Gefährdung. Eine Studie zu Vorstellungen von Verunreinigung und Tabu*, Frankfurt/M., 1998), 第 78 页。

② C.v.Braun,《假相探析:宗教、文字、图像及性别》(*Versuch über den Schwindel. Religion, Schrift, Bild, Geschlecht*, Zürich, 2001)。

美学领域内的纯形式或纯艺术指的是一种与政治、宗教或其他“信息”无涉的艺术观念,即除艺术本身以外不含有任何其他内容。在艺术领域,“纯粹”也可以代表一种纯思想或纯形式的美学,例如纯文学、抽象艺术、抽象音乐,等等。“纯粹”还可以指一种建筑,这种建筑的形式取决于单纯的功能方面的考虑。试图传递某种政治或宗教信息的美学形式当然也会借用“纯粹”这一概念,例如理查德·瓦格纳^①的“剧场庆典节日剧(Bühnenweihfestspiel)”,以及推崇“血与土”、将现代艺术斥为“堕落”、“病态”和“怪异”的纳粹艺术。所有这些都涉及对某种“异质”——无论其具有何种定义——的排斥。诸如在保护某个民族或地区不被外来文化“异化”时,人们往往提及语言的“纯洁性”。

“纯粹”概念与身体性及触觉密切相关,而触觉(尤其它是与“性”的关联)通常又被认为是对“纯粹精神”的一种玷污,所以自亚里士多德起,视觉就一直被视为最纯粹的感官形式,原因是视觉的存在使观看者与观看对象之间能够保持一定距离,因而具有较强的抽象功能。进入现代之后,视觉与科学之间又建立起一种紧密联系,而这一联系的关键在于:“认知”几乎成为“观看”的代名词,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借助显微镜等光学仪器所能观察到的科学认知对象,同时也适用于使原本不可见的事物(例如大脑内部活动、DNA 双螺旋结构等)变为“可见”的计算机生成图像。合成图像并不是一种摹写,而是一种象征性转化,其对象为可通过图像加以再现的过程。恰恰是这种合成图像成为了当今“纯科学”的一个标志,它表明后者已摆脱了包括视觉这一最抽象形式在内的感性知觉的“玷污”。与神学话语的生物学化一样,合成图像也是性别编码植入科学领域的一种体现。

一般而言,科学的所谓“纯粹”内含了这样一个观点,即知识必须远离可通过感官加以感知的世界和一切“感觉”;它意味着对情感,尤其是

^① 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国作曲家、指挥、戏剧家兼作家。——译者注

主观性、非理性或“激情”等一切人为因素的排斥。因此,心理因素之于“纯洁”具有重要作用。希腊语中的“Katharsis”一词意为净化,具有“感情宣泄”之意。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一种引发“Katharsis”的手段。毕达哥拉斯学派则代表了相反的观点,他们主张音乐是克服恐惧的最佳途径,因为音乐是所有艺术中同数学最为接近的一种。现代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学及其“扫烟囱”疗法(约瑟夫·布洛伊^①的患者安娜·欧将自己接受的治疗过程称之为“扫烟囱”),^②同样依赖的是一种类似的“Katharsis”:通过口述和意识唤起使患者的灵魂从压抑中解脱出来。其他疗法尝试则是通过“宣泄”来解决心理冲突。无论如何,“纯粹的知识”或曰可量化、可验证的知识,只有在排除了感情因素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而感情本身则应当被视为“杂质”。在这一领域同样可以观察到一个矛盾的历史过程:在“有性状态”(在广义上代表人的“感性”)遭到一段时间的排斥之后,又出现了一种对感情的正面评价——即性别编码的植入:1770年前后感伤主义(Empfindsamkeit)的流行,以及日后兴起的颓废主义(Décadence)对感性、激情和痛苦前所未有的标举都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由此可见,性别秩序的历史变迁不仅影响了诺伯特·伊利亚思^③所研究的“感性历史”,同时也对知识体系的演变起到了一种推动作用。

正因为“激情”与强烈的情绪被视为“杂质”,所以性欲在许多文化中被定义为有待规训和清理的“不洁”事物。不同文化对此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例如规定与什么人性交是“纯洁”或“不纯洁”,或者通过严格区分(无性的)神圣与(有性的)世俗来定义“纯洁”。第三种形式是对性进

① 约瑟夫·布洛伊(Joseph Breuer, 1842—1925),奥地利精神病医生、生理学家、哲学家,心理分析学派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② 参见 D. Hunter,《癡病:心理分析与女权主义——安娜·欧病例》(*Hysteria,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The Case of Anna O.*),见 *Feminist Studies* 3.(1983),第9卷,第485页。

③ 诺伯特·伊利亚思(Norbert Elias, 1897—1990),犹太裔德国社会学家,代表作《文明的进程》。——译者注

行“神圣化”，即将性欲和超验混为一体。在对西方知识体系具有决定作用的基督教神学中，“生命源于性”的观念逐渐让位于一种观点，即“纯粹精神是‘可孕育果实的种子’”。这种构想往往隐含着一种认识：作为身体性及性欲之象征的女性身体等同于“不洁”的繁殖力。如果说女性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被排斥在教会工作、文化活动以及科学领域之外的话，那么这背后隐藏的其实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女性身体会对“知识”的“纯粹性”构成一种危险的玷污。

总的来说，“纯粹”科学即意味着科学研究不应受到任何心理、历史或“主观”因素的影响。如果说，有关“纯洁”的神学理念还有可能被“性”（或“肉身性”）所玷污的话，现代科学则依据了这样一种“纯粹”原则，这种原则建立在排除一切偶然性的基础上，因此它的“最纯粹”形式只有在外界影响和作为观察者的主体被化简到最小的实验室中才能实现。但科学排斥偶然性与神学排斥肉身性之间的区别并没有看上去那样大，只是同一种排斥转移到了不同领域而已。神职人员通过在修道院中禁闭苦修来使自己远离世俗生活及肉身性的有害影响，这种功能如今已被实验室所取代，后者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修道院。新的隔离形式要求的并非禁欲，而是要排除“科学家的身体”要素，因为“科学家的身体”为潜在的“不纯粹”和偶然性提供了可乘之机。也就是说，现代科学在理论上告别了对主体的“纯洁性”要求，只有当科学彻底成功地取代了科学家本身，“纯科学”才能自视为完善。而这一点只可能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实现；相反，在人文科学领域，研究者却必须具备“感性”——这为新的知识体系的诞生提供了一种合理解释。理想形式的硬科学即一种“排除了科学家身体的科学（science without the body of scientist）”。而颇具意味的是，身体性的化身——女性恰恰在这一历史时刻踏入了科学王国。原则上，纯科学已经摆脱了对科学家“纯洁性”的要求，因此即便是女科学家也不再被视为一种玷污性角色了。

性别编码植入科学领域：性别化与去性别化

如果说西方知识体系是通过将涉及主观性、非理性和性的知识清理出局而得以建立的话,则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女性——连同女性在“性”方面的指代功能——恰恰在一个“性”和“偶然”遭到排斥的历史时刻被允许进入知识体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科学发展史做一回顾,以探明科学如何使自己的梦想——即创造出一个合乎实验室标准的研究者——几乎变为了触手可及的现实。由于合乎实验室标准的研究者同科学本身一样“纯粹”,所以确切地说,这个梦想即创造出一间没有研究者的实验室。凭借医学研究成果,人体——包括研究者的身体在内——被转变为一个可以在试管中制造出来的产品,从而为这一科学乌托邦的实现创造了前提。随着 1830 年前后对排卵现象的发现,以及 1875 年前后对繁殖过程所取得的进一步认识,西方科学发现了通往一种知识的大门,这种知识从一开始便占据了西方人的知识幻想,它便是根据计划好的、排除了偶然性(尤其是性吸引力方面的偶然性)的机制来实现人类繁育。由此,古老的西方科学幻想距离它的实现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一科学幻想最早源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关于有计划繁衍人类的构想,其后在亚里士多德的生殖理论中以“科学”的形态得以反映,并最终在“精神种子”这一基督教概念中找到了它的神学表达形式。尽管迄今为止在试管内培育和生现代科学家的梦想尚未实现,但实验室及实验室里的研究条件却为此提供了不小的帮助。试管造人——无论是人机还是其他形态的人工生物——构成了 20 世纪的未来构想和科学幻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题材的影片和小说中,现代科学幻想的根本目标乃繁育科学家本身这一想法却很少得以表现。等级社会中的每一个精英都在利用对知识媒体的掌控,以便根据自己的意图来改写或固化社会记忆与历史。既然如此,一种从“科学家肉身”中解放出来的科学为什么不能设法创造出属于它自己的、能够让科学永生不灭的科学家呢?

与旧的知识体系一样,新的知识体系也需要被“生理化”,它需要成为一种更大程度上的、另外一种形式的“自然”。如果说,旧的知识体系曾试图将一切阻止它实现“纯粹抽象”的事物、尤其是性别排斥出局的话,新的知识体系则必须创造出“繁育”新型科学家的必要参数。这一任务需要被加以生理化,其生理化过程并不“使用”现有的性别编码,而是要创制一套全新的性别编码。于是便产生了性别编码如何被植入知识系统的问题。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既然随着西方知识体系与性别秩序的产生,“女性”开始作为“性”的编码被使用,那么可想而知,它也可以被用来为新的知识体系配备性别符号,以帮助该体系完成“生理化”过程。知识结构加载性别编码方面的种种迹象不仅贯穿了现代知识体系的形而上学本身,而且在语言应用和使该知识体系得以实现的现代传播及存储系统中也得到了清晰的反映:只要联想一下“全新处女硬盘”、“二进制代码”及其所依赖的“穿孔卡系统”,以及提示电脑启动运行的人工合成女声,便足以明白这一点。

关于性别编码通过何种方式被植入单个知识领域和理论话语,本书收录的文章将分别做以说明。书中还将围绕性别编码的植入变为完全可被分析和破解的过程这一事实进行阐述。该事实可被称之为性别研究及其特有的“求知欲”的主要动力,它与近一个半世纪以来性别秩序的变迁有着直接关系,并且在各种新的性欲理论中也得到了清晰的呈现。这些新理论的产生与知识体系的转变同时进行,而科学界也是从这时起开始逐步接纳女性成员——这种同时性足以引起重视。

将女性等同于“性”的话语在 19 世纪中叶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反转。早在 1900 年前后,作家兼性学家亨利·哈维洛克·艾利斯^①就在《性心理研究》一书中表达过类似见解。^② 艾利斯谈道,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所有

① 亨利·哈维洛克·艾利斯(Henry Havelock Ellis, 1859—1939),英国医生、性心理学家、社会改革家。——译者注

② H.H.Ellis,《性心理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Kingsport, Tenn., 1897—1928)。

的性欲理论都抱着一个一成不变的观点,即认为女人在性欲方面远“胜于”男人。他在此引述了希腊神话中关于预言家忒瑞西阿斯(Teiresias)的故事:忒瑞西阿斯由于泄露了“女人的性欲十倍于男人”这一秘密而被赫拉弄瞎了双眼。艾利斯还引述了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Juvenal)的观点,后者曾写道,任何女人都绝对不会有兴趣变为男人,因为男人的肉欲与女人相比少得可怜。他同时还列举了盖伦的科学理论,盖伦认为:由于女人拥有较强的性欲,因此相比男人更难忍受禁欲生活。^①规定了西方思想中以驯化或重塑女性特质为内容的种种措施,便是以上述这些游走于神话和科学之间的观念为基础。而自19世纪中叶起,与上述论断截然相反的科学观点开始日益流行。学者阿格顿(Agton)在他发表于英国的一篇论文中称,认为所有女性都有性感受无异于一种低级辱骂。在巴塞尔从事研究的赫尔曼·斐林^②指出,年轻女孩在恋爱时表现出的性欲属于一种病理现象。^③德国精神病学家保罗·阿道夫·内克^④则断言:“女性在性欲方面普遍弱于男性。”^⑤无疑,这些论断不过是一种“不具科学性”的尝试,其目的在于建立起一种新的象征性性别秩序。而首先耐人寻味的一点是,这些论断均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并且在19世纪末凭借理查德·冯·克拉夫特-艾宾^⑥等一批声名卓著的科学家的理论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艾宾曾在其撰写的《性精神病态》一书中称:“逃避女人的男人和

① H.H.Ellis,《女性的性冲动》(*The Sexual Impulse in Women*),见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第1卷,第2部分,第197页。

② 赫尔曼·斐林(Hermann Fehling, 1847—1925),德国妇科学家、产科医生。——译者注

③ 二人均引用了《女性的性冲动》,第194—195页。

④ 保罗·阿道夫·内克(Paul Adolf Näcke, 1851—1913),德国心理学家、犯罪学家,以大量同性恋研究专著而闻名。——译者注

⑤ P.Näcke,《性批判》(*Kritisches Kapitel der Sexualität*, *Archiv für Psychiatrie*, 1899),第341页。

⑥ 理查德·冯·克拉夫特-艾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 1840—1902),奥地利精神病医生、法医学家。——译者注

沉迷于性享乐的女人都属于不正常现象。”^①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这种新的性别秩序何以产生，它对于建立新的知识体系有何益处？

新的知识体系不仅“发现”了男性在性欲方面的优势，而且在性欲和精神活力之间明确建立起一种关联——自西方知识体系诞生以来尚属首次——并鼓吹这种关联对科学发展所具有的作用。初听上去，这似乎与先前阐述的论点相互矛盾，即知识体系所追求的理想是“没有身体的科学家”——尤其是没有“下半身”的科学家；然而进一步观察便会发现，这种矛盾事实上并不成立。性欲与知识系统的结合通过两个方面实现：一方面是以达尔文为代表的生理学理论，另一方面则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阐释模式。两个学派都是用男性在性欲方面的“优势”或性欲本身的“男性特征”来解释男性在精神即求知能力方面的“优势”。在生理学角度的解释中，对动物界与自然界的引用十分明显。如果说以往的科学与求知能力都是以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区别作为解释依据的话，生理学角度的解释则强调了男性与动物、尤其是灵长类动物在性欲方面的相似性，从而为男性在“精神方面的优势”提供依据。达尔文认为，男人一旦着手从事某项活动便会达到比女人更高的水平，无论这项活动需要的是深度思考、理性、想象力，还是感官和双手的单纯使用，两性在智力方面表现出的这种区别源于性别的自然选择法则，基于这些法则，“在人类的半人祖先和原始部落中[……]”，（男性成员之间）“围绕女性展开了持续若干世代的争夺”。^②弗洛伊德也将力比多视为精神与文化活力的前提，他将从事精神与文化创意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从事研究而不得不放弃性生活的“学者”；另一类是“完全无法想象禁欲生活”并“通过性体验来为艺术创造提供强大刺激”的艺术家，随后弗洛伊德又补充道，总体而言他并未获得这样一种印象，即“禁欲有助于培养精力充沛而独立的

^① R.v.Krafft-Ebing,《性精神病态》(*Psychopathia Sexualis I*, München, 1984), 第1卷, 第12—13页。

^② C.Darwin,《性选择》(*Die geschlechtliche Zuchtwahl*, Leipzig, 1909), 第250页。